



中学阅读文选

文选编选组编

ZH·Y·W

目 录

(上 册)

记叙文

回忆秋白烈士.....	茅 盾 (1)
知公此去无遗憾	
——痛悼郭沫若同志.....	夏 衍 (6)
怀念老舍先生.....	曹 禺 (11)
哭一多.....	吴 晗 (15)
给后代留一片青山.....	宫苏艺 (20)
彭德怀.....	(美) 斯 诺 (24)
两个梅岭之夜.....	白 桦 (30)
最初的带路人.....	何 为 (38)
大兴安岭的玫瑰.....	叶 楠 (43)
幽谷鹿笛.....	韩静霆 (48)
序曲.....	韩少华 (52)
手册.....	林 遐 (57)
他的传说.....	金振家 (62)
寻船.....	未 央 (66)
勤奋出天才.....	郭梅妮 (71)
昆仑桥.....	王宗仁 (78)

永恒的春天.....	碧 野 (81)
竹庄草青青.....	陶斯亮 (84)
紫阳山下读“红楼”.....	茹志鹃 (90)
荷花·荷花.....	雪 韵 (95)
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 (100)
猎户.....	吴伯箫 (105)
牡丹园记.....	严 阵 (112)
秋瑾.....	闻少华 (118)
契诃夫.....	许嘉利 (124)
八烈士.....	白 朗 (131)
七勇士.....	杨 朔 (139)
云天忆.....	于雁军 (147)
热田赋.....	杨星火 (153)
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	巴 金 (157)
往事 (十四).....	冰 心 (162)
春夜奇遇.....	牟传俊 (165)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臧克家 (167)
蓦然回首.....	袁 鹰 (171)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李大钊 (175)
一种云.....	瞿秋白 (177)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 (179)
野草.....	夏 衍 (183)

香山红叶.....	杨 朔 (184)
急流.....	刘白羽 (188)
春归燕园.....	季羨林 (191)
花.....	叶永烈 (194)
城在白杨深处.....	袁 鹰 (198)
白云尽无时.....	徐 刚 (203)
搪瓷茶缸.....	万 全 (206)
故乡的龙眼树.....	孔捷生 (208)
小溪流的歌.....	严文井 (211)
马蹄莲.....	包 蕾 (216)
一个官员的死.....	(俄) 契诃夫 (218)
米龙老爹.....	(法) 莫泊桑 (223)
丹柯.....	(苏) 高尔基 (231)
小抄写员.....	(意) 亚米契斯 (236)
穷人.....	(俄) 列·托尔斯泰 (244)
麦琪的礼物.....	(美) 欧·亨利 (247)

回忆秋白烈士

茅盾

二十五年前，在瞿秋白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二十五年后今天，我再拿起笔来写怀念秋白同志的文章，却是含着欣慰的眼泪，为了庆贺秋白同志“再生”！十年的浩劫啊，对于长眠地下的秋白，也许只不过是一场冻雨①，可是活着的人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这奇耻大辱！

我与秋白相识是在一九二二年，最初只是文字之交。我从他的文章，猜想他是一个博学，思想锐敏，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后来，在上海大学第一次见到了他，果然人如其文：高挑身材，苍白的脸，穿一件显得肥大的竹布长衫。那时，他是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兼课教员。他与郑振铎在北京就是老相识，通过振铎，我与秋白接近多了，又渐渐觉得，他不只是有文人的气质，而且，主要也是政治家。他经常深夜写文章，文思敏捷，但多半是很有煽动力的政论文，用于内部讲演，很少公开发表。间或他也翻译点文艺作品，写点文艺短评，因此，郑振铎就拉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但那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发挥文学的天才。

一九二四年冬，秋白与杨之华结了婚，搬到闸北顺泰里十二号，组织了小家庭，正好住在我家的隔壁（我住在十一号），我们的往来就更频繁了。当时我是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

支部会议经常在我家开，秋白代表党中央常来出席。他常与我谈论政局和党内的问题。他很尊敬陈独秀，但不满陈的独断专行。他和我一样对彭述之的不满，认为彭浅薄，作风不正，并对陈独秀的信任彭述之有意见。“五卅”惨案发生后，陈独秀主张发动三罢（罢市、罢工、罢课）来动员群众，制造舆论，压迫帝国主义让步；瞿秋白则认为应该更积极一些。他同我谈话时主张动员大批工人、学生连续到南路上示威，看英国巡捕敢不敢再开枪。如果竟敢开枪，那就如火上加油，将在全国范围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怒潮，也将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他这意见陈独秀不同意。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我和秋白又有一段交往。我那时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编。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全部在共产党员手中，社长是董老，总经理是毛泽民，编辑部的编辑除了一个人全部是共产党员。那时董老事忙，无暇顾及这个报的编辑方针，就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当时秋白兼管宣传部，后来彭述之（他是宣传部长）到了武汉，又由彭领导。“四、一二”事变后，陈独秀和彭述之多次对我说：民国日报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要少登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消息。为此我请示董老，董老说不理他们。我也向秋白讲了，秋白想了想说：我们另办一张报！那时秋白的工作很忙，我除了有重大的消息要找他核实或请示，平时很少见到他。不过他对于党的喉舌——报纸，始终很关注。因为《汉口国民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所以国民党右派，左派都来干涉我的编辑事务，我时常向秋白诉说，因此，他早就有另办一张报纸的想法。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把这个报纸交给国民党左派，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

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主张我们的党报仍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这件事，秋白很重视，积极筹备，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

一九三〇年夏，秋白和之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听说我也从日本回来了，就要找我。他们用暗号代真名写信交开明书店转我收。秋白改姓何，之华改姓林，还有住址（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和我妻（孔德沚）按地址去访问，才知道他们夫妻是住在一个普通的楼房里，楼上卧室兼书房，楼下算是客厅兼饭堂。我们到楼上闲谈，秋白问了我在日本的生活，又向我介绍了这几年国内的革命形势，他对于我以写小说为职业表示赞同。大约过了一年多，那时王明已经上台，我风闻秋白同志受到了打击，心情不好，就与德沚又去拜访他们。我见秋白瘦了，之华说他的肺病又发作了，但精神仍旧很好。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故事的情节。这是一九三二年夏，我刚写了《子夜》的开头几章。我就说，下次把原稿带来再谈吧。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我话还没有完，晚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

逼，他们往哪里去呢？我就带他们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二房东是一个宁波商人。这幢房子是三楼三底带厢房，我住在三楼，身份是教书的。秋白夫妇来后，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的，过几天就回家。之华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则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些日子里，秋白继续同我谈《子夜》。秋白看书极为仔细。《子夜》中吴荪甫坐的轿车，我原来是“福特”牌，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这两点，我都照改，照加。后来我们还议论了当时文艺界的情形，他对当时尚存在的“左”倾文艺思潮也持批评的态度。秋白还表示，他也想搞文学，写点东西。他也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答应为他们俩介绍。有一天，忽然冯雪峰闯来了，原来他们俩人也不认识，我只好为之介绍。我就考虑，说不定还有什么人闯来，不如让秋白到鲁迅那里去住。鲁迅那时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座公寓楼房内，这个公寓住的全是外国人，其中有少数日本人，公寓斜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因此，一般闲人都不到那公寓里去，比我这里安全得多。我就托雪峰把秋白带到鲁迅家里去，介绍给鲁迅。秋白后来就在鲁迅寓中避难，直到之华探知原来住的地方没有出事，才搬了回去。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与友谊从此开始。

这以后直到一九三三年底，秋白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他热心地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也用化名写了不少犀利的杂文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御用文人。我与他见面时常谈论文艺问题，有时我们也有争论，但多半我为他深邃的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折服。但是，谈到他

自己，他总是十分谦逊。记得那时他写给我和鲁迅的短信中有一次署名“犬耕”。我们不解其意。秋白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他进而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 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他这番自知之明，自我解剖的话，使我们肃然起敬。

一九三三年末，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临行，向鲁迅辞行，也向我辞行。那次，他谈了很多话，但我总觉得他的心情有点郁悒；也许这是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又要走上新的征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秋白。一年以后，传来了噩耗，得到了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消息。那一年，秋白才三十七岁！

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袖之一，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和秋白相识多年，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能肝胆相照的挚友！秋白生前曾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他死后又遭到“四人帮”的诬陷。现在，被颠倒的一切终于又颠倒过来了，我真诚地祝愿秋白的灵魂得到安宁！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

（选自1980年3期《新华日报》）

提 示：

这篇回忆文章，从与秋白同志相识，写了秋白同志的形象、身份、特点；进而着重写他在上海、在武汉、从苏联回国以后，他的政治见解、文学主张、自我剖析精神以及彼此间的

来往和友谊。

开头段是著文的目的。从二十五年前秋白英勇就义后写纪念文章谈起，引出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庆贺已故二十五年的秋白同志之“再生”，即是为长眠地下的同志洗雪“奇耻大辱”。

结尾重申秋白同志的重大贡献与历史功绩。四个“一个”句，是作者从“相识多年”的历史考验中，“始终认为”的，表明从未因林彪、“四人帮”的恶毒诽谤而动摇过。结尾段这样写，是与著文的目的分不开的。

《回忆秋白同志》、《知公此去无遗憾》、《怀念老舍先生》和《哭一多》四篇都是回忆先辈的文章，作者都是记叙自己熟悉并且能反映人物的身世、经历、政治态度以及道德面貌的事实，有的明显地表示出以时间先后为序，有的则是选择人物的一些特点加以叙述。写法上都没有修饰和夸张，都没有陪衬和烘托，但情真意切，读起来都很动人。

①冻雨：夏天的暴雨。这里比喻林彪、“四人帮”对秋白同志横加诽谤和诬蔑。

知公此去无遗憾

——痛悼郭沫若同志

夏 衍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奠基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和一位缔交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诀别，悲痛之情是难以尽述的。

一九二三年，我作为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到博多去访问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豪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九二六年他通过许甦魂同志寄给我一张戎装的照片，我知道他投笔从戎，成了北伐战争前线的英勇战士。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我从东京回到上海，经子渊先生从一本线装书中取出一张登载着《请看今日蒋介石》这篇雄文的报纸，当我看到：“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的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他已经不是民族民主革命者，而已经是站在党的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痛击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这篇文章的力量和影响，不是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估量的。当时，蒋介石还有很大的欺骗作用，正是这一篇文章打中了蒋介石、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的要害，同时也擦亮了千万知识青年的眼睛。也正因为如此，在上海的刽子手陈群、杨殿，就千方百计地要置郭沫若于死地而后快。同年冬，他被迫亡命日本，过了艰苦的流亡生活。但是，他没有悲观、没有消极，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进一步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他决不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钻进了甲骨文、青铜器和线装书的故纸堆，而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了中国古代历史。有人说，这时期他过了十年的“书斋生活”，事实完全相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不仅和国内的革命斗争有经常的联系，同时还团结和培育了许多留日革命青年，创办了《留东新闻》，支持了“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部出版的《质文》等

革命刊物。他曾计划全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但由于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而未能实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毅然孑身回到上海。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住所，当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行李时，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一支笔。”的确，他一到上海，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和我几次到浦东、闵行去劳军，写下了《轰炸中来去》、《东西线归来》等激动人心的报告、速写。他创办了《救亡日报》，亲任社长。他团结了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在他主持下，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队和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到前线和后方去作宣传、服务工作。在这一段时间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他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他说，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接着，他又回忆了一九三六年在东京的往事，他说，当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谈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我是很难接受的。过了几天，当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就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这，就是郭老坚定不移的党性。

上海沦陷，沫若同志决定离开上海，经香港赴武汉，组织上还决定我把《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在他临行前，我向他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他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是郭老高贵品质中的一

个显著的特点。我不能忘记长沙大火前夕的一段往事：广州失守后，我和《救亡日报》撤退到桂林，立即到长沙去向郭老汇报，可是赶到长沙，正碰到长沙大火的前夕，我到晏华林，他正忙着第三厅的撤退工作，连坐下来谈话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我去见周恩来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来得不巧，没有细谈的时间，可是，也来得正好，沫若同志离不开三厅，就请你护送于立群同志去桂林吧。”当天傍晚，当我和于立群同志等离开长沙的时候，我满以为可以和郭老一见的，可是，真的是公而忘私，他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

皖南事变之后，《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把在重庆和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而郭老却岿然不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到香港后不久，收到一封署名鼎堂的来信，他庆幸我们平安脱险，要我妥善地安排同人的生活和工作。他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那棵大树~~。”很明白，“租界”指的是文化界，大树，指周恩来同志。

一九四二年四月，~~香港沦陷后我们逃到重庆~~。这天晚上是《屈原》演出的最后一场，~~他特地送我来看~~，并一起到后台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朋友。几天后，周恩来同志在天官府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对我们刚从香港回来的人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几十年的往事是说不尽的，全国解放后，郭沫若同志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在文学、艺术、科学、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是说不尽的。在缅怀他的功绩的时候，我还想沉痛地说，使郭老早日离开我们，林彪、“四人帮”

对他的诽谤和迫害，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九七七年，在阔别了十多年之后去探望他，那时他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可是他还是那样亲切、高兴。当我们谈到全国人民为粉碎“四人帮”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一再表示了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爱戴和感。大家知道，一九七四年江青一方面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同时又纠缠着他，妄想拉他当“梁效某顾问”式的角色，他毅然顶住了恶浪，可是愤懑和忧郁使他身心交瘁了。于立群同志说，他病情恶化，正是一九七四年开始的。

“知公此去无遗恨，又见征途万马奔”。这是赵朴初同志《郭沫若同志挽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诗，很好地表达了我们这些后死者的心情。他奋斗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和病魔搏斗中，他终于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覆灭，他唱出了“大快人心事”的壮歌，他又看到了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一九二七年他在《忘时》诗中的预言：

“神州原来是赤县，今看赤帜满神州”，已经实现了，万马奔腾的新长征，已经开始了，他，可以毫无遗憾地安息了。

（选自《往事与哀思》，上海文艺出版1979年版）

提 示

这篇痛悼郭沫若同志的文章，缅怀了这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也是作者“缔交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的功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著文揭露蒋介石；流亡日本时期，他不忘国内革命斗争，并培养青年、创办革命刊物、翻译马列主义书籍；芦沟桥事变后，他孑身回国，听命于周恩来同志的调遣，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敌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文中强调指出：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是他早逝的重要原因；但他亲眼看到“四人帮”的复灭，看到文艺科学的春天，他可以毫无遗憾了。文章的标题，即取此义。

本文感情真挚，文字平实无华。

怀念老舍先生

曹 禺

我和老舍先生都是经过旧中国的灾难与痛苦的人。他比我年纪大，是我的前辈。我们都属“狗”，他比我大一轮，比我早生十二年。

他出身贫寒，当过教师，也当过教授。在我从南开中学毕业之后，我才知道他也在那个中学教过书。因此，从过去老人的眼光看，老舍虽未亲身教过我，但我也应该认他为“老师”的。

我认识老舍是在抗战中的重庆。当时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文艺界一切抗日力量。记得我们便是在那个协会认识的。他很穷，居无定处。有时在张家花园那个协会住一阵，有时便找一个报馆中的一间简陋的房间住下。无论酷暑寒冬，他总是在他的不大见得到阳光的小房间里，一天一天埋头著作。

夏天的重庆是个大火炉，热得人无处藏身。没有风，没有树，到了夜间，屋内的床席，桌椅似乎都烫手。但老舍先生，除了偶尔会客、开会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夜地写，写，写，……用他的心血写出各种体裁的作品。

他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嫉恶如仇。对那些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不抗日，专吸人民膏血的国民党反动派，他是决不相容的。但他对一贫如洗，剥削者视为卑下的苦艺人，却待若宾友。我记得一位艺名“山药旦”、唱大鼓的老艺人，老舍先生虽是两袖清风，却总在这位老艺人最困苦的时候，拿出

自己的稿费周济他，并且经常为这位受苦受难的艺人写大鼓词，甚至为他的家事排难解纷。当他受国民党特务欺凌时，老舍便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敢说敢当。

老舍慷慨好客。即使在那毫无出路的重庆山城中，如若来了一位远方的友人，他必盛宴款待。而那盛宴的费用是他典当或变卖了自己的衣物才得来的。他好喝几杯黄酒，酒量不大，但酒酣之后，便引吭高歌，声动四壁。

老舍在重庆时，敬爱的周总理常请他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便饭，我也在座。周总理（有时王若飞同志也在）总是对我们分析形势，慷慨地谈起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不抵抗日寇，却天天打内战、反共、反人民；又细细地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抗日救国的事实。使我们终于明了革命的正义的事业，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以后老舍还带领“作家前线慰劳团”到延安访问。这使他更确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救中国的、爱人民的、正确的党。

一九三六年，老舍在青岛写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他是老北京，对北京底层的人们是熟悉的，并寄予说不完的同情。骆驼祥子的命运，正是典型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一生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那时老舍在美国讲学。周总理对我说：“你写封信请老舍回来吧，新中国有许多新事可以写。”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写了信，老舍立即整装回返祖国。从此他用全副精力大写社会主义祖国的新人新事。他也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此他的著作如喷泉，如瀑布，如倒悬的黄河，无昼无夜地在他的笔下奔泻出来。他不但写得多，而且各种各样的体裁都写。新、旧体诗歌、小说、戏剧、曲艺、相声，以至为人写新内容的春联。

每次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响应，用他生动的笔，写出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好文章。

他工旧体裁的诗，精书法。一般说来，有求必应。因此他的诗与书法到处流传。北海的“仿膳饭庄”的“仿善”二字，便是他的手法。

他爱收集美好的水墨画与扇面。我有时访他（多半在下午，上午他是不会客的），他总是从他的小书房里欣然走出来，给我一杯浓郁的花茶，谈得高兴时，便拿出几幅他引为得意的字画给我欣赏。我虽然不懂字画，但也因为他那样欣喜，感到愉快。

他好花，尤其爱养菊花。到了秋天，他的小庭院里便摆满了斑斓夺目的菊花。这是他和他的夫人胡絮青同志共同培育的。宋朝有个周敦颐，写了一篇短短的散文说：“菊，花之隐逸者也。”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隐士”，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因此，当他的菊花成群成山，亭亭玉立，欣欣怒放的时候，他必然请许多朋友来他家中赏菊。有时还在家中便餐饮酒，那时，我也喜欢喝上两杯，几杯黄酒到了肚里，有时竟颓然醉倒在桌下，四座笑声朗朗，朋友们是那样欢悦。

老舍先生很豪放，但也谦逊。他经常赞扬郭老学问的渊博，也称赞赵树理的文章写得纯朴、扎实，没有废话。对其他人的优点，他从不吝惜他的誉美之词。

他平易近人，常有各样的客人到他的家中拜访他。他为了写作，也常常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不怕吃苦，不怕艰难。他自奉俭朴，步行街巷，从来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自居，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名人”架子。解放后，他的第一个作品话剧《龙须沟》洋溢着他对党、对人民热烈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写出了旧社会的黑暗与新社会的温